

孤獨語錄

林翎

刺青第一

「上都街肆惡少，率髡而膚割，備眾物形狀。恃諸軍，張拳強劫，至有以蛇集酒家，捉羊腓繫人者。今京兆薛公元賞，上三日，令里長潛捕，約三十餘人，悉杖殺，屍于市。市人有點青者，皆炙滅之。時大寧坊力者張幹，割左膊曰『生不怕京兆尹』，右膊曰『死不畏閻羅王』。又高陵縣捉得鑊身者宋元素，刺七十一處，左臂曰『昔日以前家未貧，苦將錢物結交親。如今失路尋知己，行盡關山無一人。』」
(唐·段成式·「酉陽雜俎」前集卷八「黥」)

只要是有人的地方，就有垃圾。而只要是人群聚居的城鎮，就會有人渣。我們一直都這麼認為。

唐代的長安城，是公元第七到十世紀間，東亞世界最繁華燦爛的大都會。如同現今世界各大都市，長安城的秩序也常常受到黑社會人物的破壞。所以唐武宗會昌年間（公元八四一—八四六年）擔任京兆尹的薛元賞，一上任，立刻就展開肅清的工作。在他眼中，

那些惡少，簡直就是渣屑，他們的存在，是人類社群的恥辱，所以，清除他們是必要之舉。

可是，從他們的肌膚上，我們卻發現一些令人矜憫的訊息。在他們浮泛、盲動的生命表層之下，亦未嘗不是隱藏著許多做為一個人的悲哀。而他們的控訴與反抗，也只有藉著那一針針扎在肌膚上的痛楚，才能宣洩。我想，沒有人會故意躲避陽光的。他們，就如同今日許許多多墮進幫派組織的少年，並不甘願被視為人渣。可是，命運、環境卻安排他們，逼使他們，走上一條窄而黑的絕巷。

我們該以矜憫的心看待他們。畢竟，他們也是人類，也是同胞。而城市卻是我們共同締造維持的，它所製造的垃圾和罪惡，我們必須共同面對，也必須共同負責。

溫柔第二

「和熹鄧皇后，諱綏，太傅禹之孫也。后年五歲，太傅夫人愛之。自為剪髮。夫人年高目瞶，誤傷后額。忍痛不言。左右見者怪而問之。后曰：「非不痛也，太夫人哀憐為斷髮，難傷老人意，故忍之耳。」」（晉·范曄·「後漢書」卷十上「皇后本紀」）

在這樣一個「老人問題」日趨嚴重的時代，後漢書的這段記載顯得格外動人心弦。

范曄距東漢和帝的時代，約莫二百年。當他動手寫和帝鄧皇后的傳記時，想必參考了不少前人的記載和傳聞，而在斟酌損益，筆筆削削之餘，竟為我們留下這樣一段有關瞎眼老太婆和小孫女的故事。無論真假，這總代表了一個史學家對人性的一種肯定和嚮往。

我們的族群，向來崇仰德性，講究人情，企慕人與人之間的關愛、體諒與和諧。無論傳統歷史中究竟存在多少阻礙「現代化」或

「進步」的質素，我還是願意相信，一種溫柔，像一個五歲小女孩的溫柔，仍是我們的存在所必須的。那是我們老祖先活了幾千年所獲得的經驗和教訓，不一定只有多麼珍貴的價值，也不是人與人相處所必須遵守的規律，但是，倘若我們不再擁有一顆溫柔的心、體貼的心，我們將會變成一種什麼樣的人呢？

期待第三

「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，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。然不忍違情曲筆，錯濫真偽，欲令心口相契，顧不愧景，冀知音之在後也。否泰有命，通塞聽天，何必書行言用、榮及當年乎？」
(晉·葛洪·「抱朴子」外篇卷四十二「應嘲」)

葛洪(公元二八三—三四三年左右)的時代，是中國歷史上政治社會極端混亂與動盪的時代：兵戈四起、戰亂頻繁，君王、貴族生活的豪奢侈靡，與平民、奴隸的困頓窘迫，恰成鮮烈對比。在那種歷史情境中，一個有良心的知識分子，除了要保全身家性命、追求個人生命的不朽與理想之外，是無法坐視天下蒼生賤如螻蟻的生存狀況的。對於他們所有苦難的籲求和控訴，他必須聲援，然而，為了「安全」，他們往往需要採取一種委委曲曲的方法，透露他們對時代、對人物的評判。葛洪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所撰寫的「抱朴子」一書，分內外兩篇，在「自敘」中，他寫道：「其內篇，言神仙方藥、鬼怪變化、禳邪卻禍之事，屬道家。其外篇，言人間得失、世事臧否，屬儒家。」由此可見，在獨善其身與兼善天下的矛盾中，他是如何努力地想要兼顧兩者。而「應嘲」一卷所言，卻又顯示出他如何的不得意，而只能「冀知音之在後也」。這似乎是中國歷代知識分子與撰述者的共同性挫敗。「史記」太史公自序有言：「昔西伯拘羑里，演周易。孔子厄陳蔡，作春秋。屈原放逐，著離騷。

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。孫子臏腳，而論兵法。不韋遷蜀，世傳呂覽。韓非囚秦，說難、孤憤。詩三百篇，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。此人皆有所鬱結，不得通其道也，故述往事，思來者。」而對他所撰述的「史記」，也有這樣的一段自白：「凡百三十篇，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，為太史公書。序略，以拾遺補藝，成一家之言，厥協六經異傳，整齊百家雜語，藏之名山，列在京師，俟後世聖人君子。」這種「俟」（等待，期待）的心情，到了明末清初的黃梨洲筆下，表現得更為清楚。在「明夷待訪錄」的序言中，他寫道：「吾雖老矣！如箕子之見訪，或庶幾焉！豈因夷之初旦，明而未融，遂秘其言也！」從書名、從序言，一種期待的心情躍然紙上。這是歷代中國知識分子生於亂世的一種委曲。司馬遷、葛洪、黃梨洲都做了很好的見證。而今人，在著書立說之時，究竟懷抱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呢？

英雄第四

「孤輪獨照江山靜，自笑一聲天地驚。」（唐·臨濟）

「擎拳撐腳，獨來獨往，人世間，亦自傷其孤另而已。」（南宋·陳同甫）

晚唐臨濟（公元八六七年寂滅），是中國禪宗「五家七中」之一——「臨濟宗」的開創者。早年向黃檗禪師問佛法，卻三問三喫棒，然而仍鏗而不舍，終於獲得黃檗禪師的印可，開創了所謂「盛用禪機、實行棒喝、舉揚無事」的臨濟宗風。

南宋初期的陳同甫（公元一一四三—一一九四年），則是一名才氣超邁、喜歡談論行軍用兵之道、言行俠縱，而屢陷於獄的讀書人。而他滿腦子的功利思想和拒絕做官的異人行徑，更為當時理學家所排斥攻擊。

這兩個人，生命歷程、時代遭遇、思想觀念，都有很大的不同，我們簡直無法在他們身上找出共同點。但是，他們的話語中，一種「孤然獨存」的英雄氣概卻相當近似。一禪一儒，對生命叩問、印證的結果，竟然如此疊合，而又無礙於各自所展現的典範，這種擱捉生命本質的深刻，教人感嘆。真是宗師人語。

死亡第五

「夫造化者，既以我為坯矣！將無所違之矣！吾安知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？又安知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？或者，生乃徭役也，而死乃休息也。天下茫茫，孰知之者？」（西漢·劉安等·「淮南子」卷七「精神訓」）

死亡，是人類所必須共同面對的，無可逃避的事實，也是一種恆定的疑惑。雖然。二千多年前，咱們可敬又可愛的孔夫子，曾說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聰明而又固執地拒絕討論死亡的課題。但是，在每個時代，每個地方，仍有許多人，被這樣一個充滿魅力的課題誘引去做思考，去回答我們共同的質疑。

西漢時代，淮南王劉安和他的賓客，在公元前一四〇年左右，集體完成了現今所見約二十一卷「淮南子」。關於生和死的問題，他們免不了要有所討論，有所爭執。他們的老前輩莊子，雖然已提出「大塊假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役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」的達觀之見，而且好像也被他們所接受，但是，從語氣看來，他們似乎對那樣的想法仍抱持一種疑惑和徬徨的態度。到了魏晉時代的「列子」「楊朱篇」的作者手中，雖然也討論了生和死的問題，但已放棄對死後世界的興趣，他藉楊朱的話說：「萬物所異者生也，所同者死也。生則有賢愚貴賤，是所異也。死別有臭腐消滅，是所同也。十年亦死，百年亦死。仁聖亦死，凶愚亦死。生則堯舜，死則腐骨。」

生則桀紂，死則腐骨。腐骨一矣！孰知其異？且趣當生，奚遑死後？」當然，不是每個中國人都這樣認為，不過，這樣的回答，對於生死問題總是比較不會引起爭吵的。

在中國之外的國度，也有許多人對這樣的問題提出解答。例如人類學界的功能主義大師馬凌諾斯基（Bronislaw Malinowski, 1884-1942）便曾過這樣的揣測：「死亡，可能為另一個世界揭開廣大無邊的眼界。」而另一位為我們所熟知的哲學家叔本華，更斬釘截鐵的說：「死亡，就是意志掙脫原有羈絆，和重獲自由的時候。」這樣說來，「死亡」似乎存在著一種莫名的希望和蠱惑，招舞我們向它前進，也難怪有那麼多「勇不畏死」的人了。但是，我不禁也要問：「誰真正知道呢？」

人生第六

「天神獻玉女於佛，佛曰：『此是華囊盛眾穢耳。』（「四十二章經」）

「齊人有盜金者，當市繁之時，至掇而走。勒問其故曰：『而（案：即你）盜金於市中。何也？』對曰：『吾不見人，徒見金耳。』志所欲，則忘其為矣！」（「淮南子」卷十三「汜論訓」）

「夫言者，所以通己於人也。聞者，所以通人於己也。瘖者不言，聾者不聞。既瘖且聾，人道不通。豈獨形骸有瘖聾哉？心志亦有之。」（「淮南子」卷二十「泰族訓」）

佛家常用「紅粉骷髏」之類，教人怵目驚心的言語，來說明紅塵種種的虛幻不真，警示眾生斬斷種種欲求和執著，擺脫苦惱的纏雜，滌洗心靈的汙穢，呈露本真的面目。可是，世間的種種，諸如聲名地位、美色財物、權力、知識 甚至僅僅是細碎的掌聲，無

不令我們栖栖皇皇，終身追之逐之，而毫不言悔。並不是我們毫無慧根，或認為佛家的話沒有道理，更不是沒受過追逐欲望時那種煎迫的苦，而是，在抉擇的剎那，我們往往都成了「盜金的齊人」——只見金而不見人，只沉醉於即可掌握之時的種種美好幻想，而忘忽短暫的佔有之後，長久的惆悵和虛無之感。而為了擺脫虛無的感覺，只好再度尋找追逐的目標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直到生命終了，倘若生命沒有終了，我們也只好在生死海中浮沉，輪迴再輪迴。或許我們本就是一群盲動的生命體，註定要過一種「瘡聾」的人生。然則，我們甘心嗎？終將無悔嗎？但願！